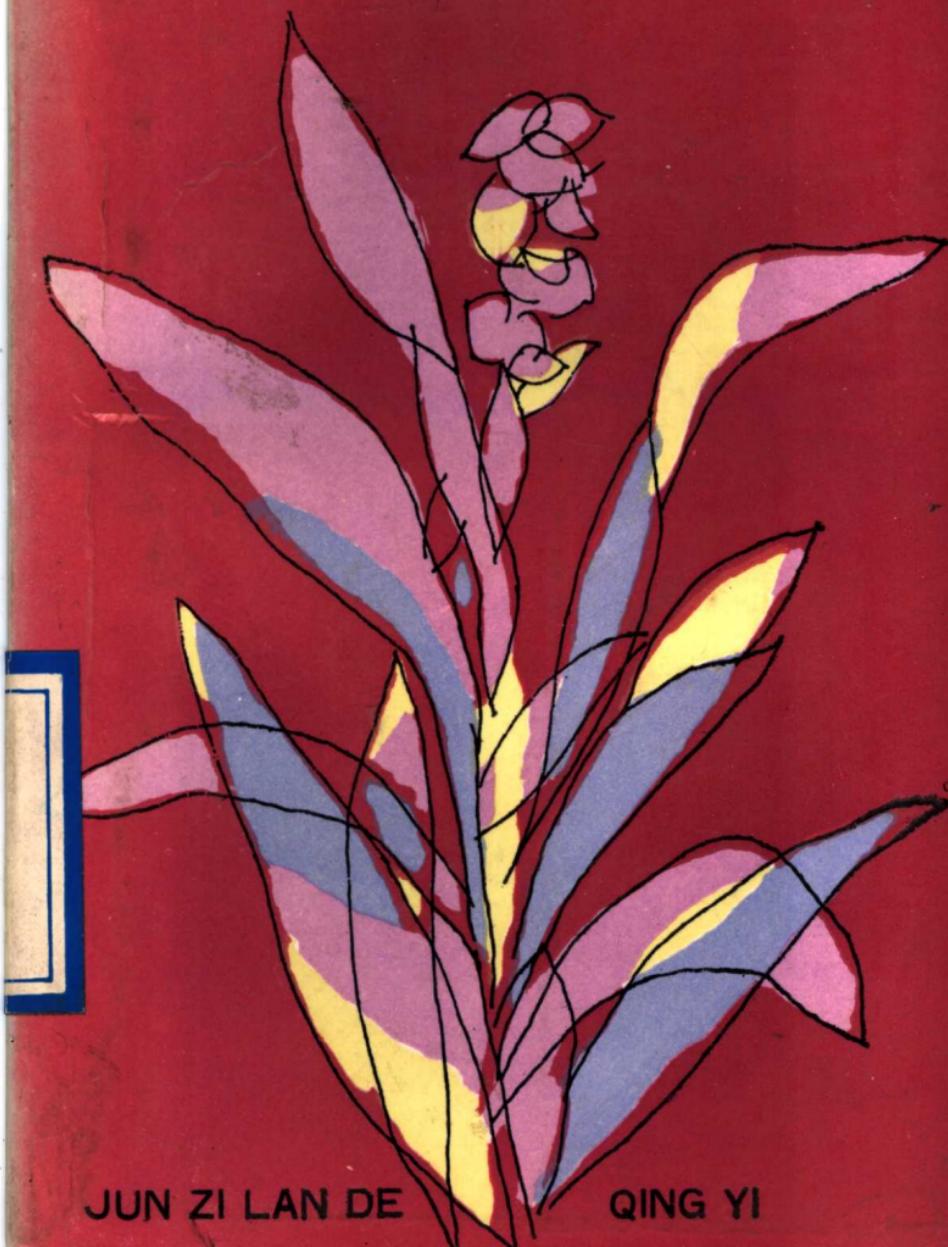


君子蘭的情意

— 編書憶舊

• 壹函稿



JUN ZI LAN DE

QING YI

1267 1261

君子兰的情意

—— 编书忆旧

董延梅

君子兰的情意——编书忆旧

董延梅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9 1/8 插页 2 字数144,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306-0679-4/I·597

定价：4.4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是一位从事编辑工作30多年的老编辑。书中收编的近60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她30多年做散文编辑工作的经验；这里摄下了她从起步到成为编辑的行家里手的组组镜头；留下了珍藏于作者心中温馨回忆的投影；散发着她用心血浇灌起来的朵朵散文之花的芬芳；记下了她作为第一读者的种种感受；阐述了她对编辑理论工作的独到见解……。这本书是经验谈，也是一部宝贵的散文史料。

全书共分六辑。除三篇论文外，其它多篇或写人，或叙事，均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致离退休的老编辑们.....	萧乾(1)
作者的话.....	(4)
郭老和他的《洪波曲》	(8)
萧乾和《一本褪色的相册》	(13)
怀念周总理的《峥嵘岁月》	(19)
三十年弹指一瞬间	(22)
难忘《倾吐不尽的感情》	(27)
《小花朵集》的问世.....	(30)
记与艾芜老的联系	(34)
怀着一种敬意拜访碧野	(38)
那棵桃树是否安然无恙?	(42)
记《忘年》的出版前后.....	(46)
剧场偶记也是生活印记.....	(49)
小开本散文的始祖.....	(53)
《非洲夜会》的出版.....	(57)

发自心灵的咏叹	(60)
《淡淡的一笔》有浓意	(64)
文如其人的黄秋耘	(68)
编者与作者有益的合作	(72)
由《阿英散文选》想起的	(75)
《扶桑杂记》的温馨	(78)
贵在心灵的沟通	(83)
永远铭记在心的往事	(87)
穆青和他的散文	(92)
《远方集》的启示	(97)
画家笔下的文采	(100)
韦君宜的《故国情》	(104)
怀念林退	(108)
祖国人民的一份情意	(113)
三十年书写的散文	(117)
难忘这位天津老乡	(122)
王锦泉和他编的书	(125)
记《丁香结》的出版	(129)
如今已是傲霜的寒梅	(133)
相识在五十年代	(137)
与河北作家群的结识	(142)
遥远的拾遗	(146)
友谊的长廊	(150)

念“花城”的良师益友	(154)
早期为工人作家出的书	(158)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回顾	(162)
盼君莫让它冷落	(166)
流派众多的现代散文理论	(170)
永远开不败的花朵	(173)
忆梅苑	(178)
君子兰的情意	(187)
西岛先生的木屐	(191)
难忘梅苑	(196)
东山魁夷散文的艺术魅力	(208)
宗璞的散文	(215)
喜读《老舍散文选》	(218)
亲情散文的艺术魅力	(221)
浅识苏雪林散文的风貌	(224)
委婉清新与情真意切	(228)
一部形形色色人生的汇集	(231)
《文心雕虫》是怎样一本书	(235)
浅谈散文书稿的编辑作用	(238)
审稿八忌	(249)
三审制与图书质量	(260)

爝火不息 (273)

编后记 (283)

致离退休的老编辑们

延梅同志：

前些日子你说你有一部书稿，要我为你写个序，我就将了你一军，或者说，向你宣扬了我的一个论点：我认为，为一本书写序，甚至写个长序，是该书作者对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她）不可放弃的权利。我还不切实际地幻想过，出版法明文规定，一切出版物付梓之前，应由作者本人撰写一篇序言，申明写作意图和内容主旨，否则不得排印，也禁止销售。这样的规定当然不可能实现，中外出版史上也向无此先例。然而我总觉得，个中不无道理。

尽管我这种有关出版的乌托邦实现不了，我仍希望你来写篇自序，概括一下这三四十年你从事文学编辑生涯的甘苦和体会。倘若你愿意；不妨把我这封信放在自序后边——然而只能放在后边。这是咱们之间的君子协定。

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无心的，只满足于完成任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另一种是有心的，不仅是完成任务，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所服务的对象，还带着深厚感情，因而也有着额外的体会、认识和收获。以教育而论，执教鞭者成千上万，其中有的仅满足于当个教书匠，有的则从编启蒙性教材进而深入研究，写起专门著述。诚然是事在人为。

在编辑行当中，自然也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也组稿，并编稿，但仅止于完成任务而已。对于手头的工作既不更多地支出，自然也得不到什么额外的收获。

记得我过去曾对你讲过，你是把组稿与同作家交朋友结合在一起的。这次通读了你这部书稿，越发感到在编辑队伍中，你是属于有心型的。每篇文章都表现了你对自己经手的稿件以及它们的作者的关怀和理解。不同于书评，这里你不仅写到了书稿，记下了你作为第一个读者的感受，以及编辑出版的过程，还写到了书的作者。我觉得你是在开辟一个新的园地：让老编辑们在离退休之后，来谈谈他们经手的书稿。这也应是新文学史料的一个来源，一种可供研究者及广大读者咀嚼的资料。

倘若这里再加上一个内容就更耐人寻味了。

难道这么多年，你同自己经手的书稿的作者之间就没有过什么争论？把这类过程写出来，会更具戏剧性，同时对读者也会有更多的启迪。当然，这同咱们的国情有所抵触。这也属于谁去给猫系铃铛的问题。能不能撇开个人，甚至不提具体书稿，只举出语言文字或内容实例来谈呢？况且这种争论，正确的一方不一定就是编辑。举出那么几项作者所坚持并最终证明他对了的事例，不也大有裨益吗？

总之，在赞成你出此书之余，还希望它将启发众多的离退休的老编辑们都来回忆一下、总结一下自己大半生为他人作嫁衣裳，当无名英雄的经验体会。

萧乾

1990年12月1日

作者的话

我在文学编辑工作岗位上干了3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能说没有茹苦含辛；但我始终觉得很幸福。尽管窗外有过狂风暴雨，生活中也有过痛苦折磨，可心里却很充实。因为我长年默默地把自己埋伏在稿件堆里，不仅在散文殿堂中寻觅到了色彩缤纷的瑰宝，也窥探了许多人生的真谛，那真是其美无比，其乐无穷。当那一本本带着油墨香的漂亮的散文书印制出来，摆在我的面前，我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很富有的人。当听到作者们满意读者们欢迎时，我几乎忘掉一切，好像我的整个生命就是依附于这个事业的。但是，毕竟岁月是挽不住的，我终于走到了这个工作的尽头，要离开这个工作岗位。这种失落感，这种眷恋之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理智告诉我，这是必定要来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向前发展，旧的必然逝去，后来者必然居上。我应该欣

然地面对现实，重新安排自己余有的岁月，而且要为我曾经倾心过的工作留下点什么，于是我想到了写我自己的“编书忆旧”。

30几年来，我编审过的散文集或别的书，不下几百种，可以写的内容很多。我首先想到的是写写那些曾经给过我支持与帮助的作者，还有他们写的那些宝贵的书。我觉得这并不仅是写我个人的事，是写一个编辑和她的作者们的关系；是写在我国文坛上曾有过不同影响的许多作家们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关系；是写百花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哪些有特色有价值的散文书，它们的出书过程又是怎样的；尤其是那些短期内或者永远也不可能重印的书，如果因为我们这些经手人的离去，永不被后来者知道，又该是多么遗憾。当然，其中我也写了不少我自己的工作感受与体会，有的虽不甚明显，却都是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我总以为，百花文艺出版社30几年来所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和她出版的任何一本好书，都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更不能忘怀老社长林呐同志、老主任徐柏容同志和其他各位领导的深谋远虑与严格要求。至于个人那是微不足道的，而事业是永存的。

开始写，我确实并没有想到出书的事，因为我知道社里赚钱的书不多，不能为我给社里增加

负担。最初，我只是给《天津书讯》写稿，写了两三篇，责编倪斯霆同志就来找我了，希望我连续写，我当然受宠若惊，就继续接着写；可也没想一下子写太多。后来有几位老领导、老同事看见了，一再鼓励我，“书讯”的主编刘云和同志也慨然允诺不惜篇幅。所以我就一口气写了40几篇。再后来，是在家长期养病的我的老同伴李申同志看见了，她没和我商量就急匆匆找到了社长、总编郑法清同志，要求他答应为我出一本书，并由她任责编。我知道李申对我写的这些内容肯定有感情。因为从60年代初，小开本散文问世，至80年代末，我们两个人都是倾注心血于这个工作的，“文革”前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写的这许多组稿与审稿工作，有许多都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做的。郑法清同志热情支持，选题论证会上也顺利通过，于是这出书的事就成为定局了。

可以说，我为人做了差不多一辈子“嫁衣裳”，如今轮到要给自己编一本书了，确实心里很慌乱，也说不清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够不够一个书的模样。大家都说应该请人写个序，我想到了萧乾同志，因为他是最先给我出这个题目的人，又总是督促我写。很荣幸他答应给写了，又将了我一军，非让我写篇自序不可。写什么呢？想了想，就写了上述这些话。请责编和总编裁决吧！只是请一

定要把萧乾同志的序放在最前面。

萧乾同志给了我许多鼓励，我觉得受之有愧。他提的不足，我倒真应该记住。其实，在处理稿件中，编者与作者的不一致和争论很常见，我也写了一些，不太鲜明；还有一些很典型的，我没有写。总编催着发稿，我想以后重找题目另写，现在只好如此了。请萧乾同志谅解。

最后，我再一次郑重地，向所有支持过我完成这本书的前辈、同志们致谢，并盼望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作 者

1990. 12

郭老和他的《洪波曲》



1958年上半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没有正式成立，我做为天津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个青年助编，雄心勃勃地准备转入百花，而且奉命要为百花的建社准备一批稿子。那时我似初生牛犊，到了北京多么有名气的作家也敢去找，多么重要的人物也敢去麻烦。记得第一个去拜访的大作家就是郭沫若郭老。

那天，我和年纪比我还轻的老编辑柯玉生同志，在王府井大街作协大楼打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正准备发表郭老的《洪波曲》。心想要是能约到这部稿子，在百花建社时出版，可就给百花创了牌子；可是像郭老这样知名的老作家，能把稿子给一个小小的地方文艺出版社吗？犹豫了

好久拿不准主意，最后两人还是决定去碰一碰。

在大院胡同 5 号的胡同口，我们又犹豫了半天。我们壮着胆子按响了门铃，没想到通报后，郭老的秘书王廷芳，一位穿军服的男同志，说郭老正要接待客人不能见我们。偏巧这时于立群同志扶着郭老从里面走出来。于立群同志一眼就看见了在门洞里的我们。她摆着手阻止了秘书，又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闻声而动，飞快地跑到了他们的身边。

当我们向他们两位说明了是来约《洪波曲》的，而且稚气地问他们是否可以给我们这个小小的不知名的出版社时，他们笑了起来。郭老竟反问我们：“我当然可以给你们，可你们为什么非要我的稿子呢？”我们当即就比赛似地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大堆理由，其实主要意思还是说明因为他是大作家，我们这个小出版社需要支持。

记得他们两位后来还把我们让到了会客室，里边确实是正待接见宾客的意思，郭老披着一件长衣坐在桌旁，微笑地端详着我们两个人，又拿着介绍信看了看，然后半开玩笑地随手拿起毛笔，在介绍信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人老珠黄不值钱”。还问我们：“你们懂吗？我老了，已经不值钱了，还是你们年轻人值钱啊！”当然我们